

=====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七九）·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四七期（zk1810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评论】	文革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上）	杜钧福
【微观历史】	第一次斗“黑帮”	冯敬兰
【往事非烟】	冀朝铸回忆录（摘译之一）	冀朝铸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评论】

文革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上）

• 杜钧福 •

文革期间，我在科学院当研究生，几乎每星期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我感觉清华的大字报水平很高。例如在大礼堂前有两幅大型宣传画，内容都是毛泽东接见群众的宏伟场面。于是就有人贴出大字报，分析两幅画在艺术表现上的得失，说明大字报内容已进入文艺批评的领域。

至于什么“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文章，还有什么“大翻个儿”的争论，现在看来似乎荒诞不经，但是已超越了两派在学校问题上的具体分歧，争论的是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能启发更高层次的思维。现在清华诸校友在反思文革上能取得显著的成绩，和当年的文革运动发展到较充分形态直接相关。

正因为如此，我不想讨论具体问题，而想就一些比较一般的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我的学识和能力，希望能在这里得到诸君的指教。

王海光先生在2016年第三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是一篇好文章。他在文中强调的是史实的认定：“简单地说，政治讲的是对错，学术讲的是真假。政治是价值判断，学术是事实判断。”在目前情况下，强调这一点是非常及时的，否则会将问题的探讨变成是非的争辩。

事实的判断应包括对事实的综合与分析，因果关系的探索，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因而随着对历史事实的确认，人们总期望得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想从中得到教训，如古人所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样一些较高层次的探讨，实际已包括在清华校友编辑的两部文集之中。例如陆小宝、沈昆等人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如关于李磊落现象的谈论。广而言之，则是20世纪理想主义的命运，因为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都是在这种精神培育下成长的。

一、走出文革话语

这个问题在清华诸君已经基本解决，但还要说说。一些学校里两派仍在争论，就是这个问题没解决好，例如贬低对方的策略，就是将对方的活动和“四人帮”联系起来。

在1966—1976年的10年里，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至今记忆犹新。而官方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的。这一方式必然使得惯以文革本身的话语描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官方给出结论，说文革是领导者错误发动、为阴谋集团所利用的一场动乱。领导者指毛泽东，阴谋集团指“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当时的人们都接受了这个论断。这也是官方在当时形势下为了稳定局面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但是后来，人们就逐渐看出了问题。“四人帮”虽然干了许多坏事，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他们也掀不起大浪。正如江青所说，我是毛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就咬谁！于是，有的人就把毛也算进去，成了“五人帮”。他们把文革描述为“五人帮”，当然还有追随他们的造反派和“党内健康力量”之间的斗争。所谓“党内健康力量”指的是周恩来等一些领导干部，也许还有刘少奇、邓小平。何新先生则把林彪也算在内。

当今很多人都接受的这种文革观实际上和文革中流行的“两个司令部”说法是一致的，只是位置颠倒了过来。一些人说，从文革开始那一天党内绝大多数干部都采取抵制态度。这显然不是事实。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都是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内。在1968年的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将刘少奇“永远清除出党”决议时，也只有一位女代表没有举手。有人解释说，他们这样做，都是不得已，是“违心”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同意王海光先生的意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论迹不论心”（《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下）》，《战略与管理》2013年3/4期）。如果只“论心”，那么何新先生把林彪算做“党内健康力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种仍以文革话语解释文革，而又被很多人接受的现象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好人 vs 坏人历史观，与此配套的是株连法和阴谋论。如果我们不能摒弃这种历史观，就会闹出笑话，例如说：“1968年，张春桥出于捞取篡党夺权资本的反革命目的，在上海提出了‘六八超六六’的口号，促使1968年上海工业生产有所回升并超过了1966年的生产水平。”（《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孙怀仁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走出文革话语就是走出蒙昧。我们必须摒弃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将文革话语的一些惯用提法清零，从第一原理出发重新研究。所谓第一原理应该是普世价值。如果不许提普世价值，说从常识出发也可。我们说清零，并非过去的一些提法完全错误，而是我们当前应完成从文革当事人到研究者的身份转变，必须有全新的视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视角和底层视角。

二、社会视角和底层视角

强调社会视角和底层视角是当前文革研究要点。文革这段历史像座漂浮于海面的冰山，我们所见的不过是其露出水面的部分，对隐藏于水下更实在的主体所知甚少。

举一些例子。一些文革研究者承认一些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在文革中争取他们自身的利益的斗争完全正当，但是从数量上看，比例甚小，所起作用可以忽略。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全红总”这个临时工合同工组织，而未必知其余。其实，在文革期间，临时工合同工组织的活跃程度不亚于正式工，只是他们在当时和现在严重缺乏话语权而不为人知。例如，上海临时工合同工组织“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曾号称上海第二大工人造反组织，有40万成员（沈福祥《我的文革岁月》，道客巴巴），参与了1966年底到1967年初上海的所有造反活动，但被视为“经济主义组织”遭到造反派排斥，于1967年2月解散。解散是根据2月18日中央解散全国临时工组织通告执行的。但是这个通告措辞不严格，没说清是全国性的临时工组织，还是所有的临时工组织都该解散，所以还有一些临时工组织幸存下来。例如武汉地区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武汉工人第二造反司令部”，简称“赤总工二司”，在武汉和湖北全省有60万成员，参加了武汉造反派文革期间几乎所有抗争活动（钟逸《一个受到当权派和造反派共同排斥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赤总工二司简介》，六十年代，2015）。在1967年2月前，类似的组织遍布全国。在天津市夺权时期，有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反修战士兵团”参与天津日报事件（《王林日记》，《记忆》23期，2009）。在江西省南昌市，“临时工司令部”曾是该市四大造反派组织之一，在摧毁保守派“赤卫队”中起了重要作用（江西井冈山《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乌有之乡手机版，2011）。在河北省邢台市，1967年2月1日“全市厂矿合同工、临时工组成591个群众组织在市工人俱乐部召开批判‘地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揪斗地、市委领导人。（《邢台市志》，大事记，网络版）。在张家口市，1967年1月24日，一些被解雇的临时工成立的组织“红色造反兵团”数百人冲进市政府首先宣布夺权。（桃花源客《张家口市“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67）纪实》，张家口热线论坛，2007）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二月镇反”中，两个全市性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吉林省工人造反大军”和“长春市群众自发造反大军”，以及类似的“吉林市街道工业造反大军”被取缔。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即使从参与人数来看，合同工临时工等边缘群体在文革中的作用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只是他们缺乏代言人，在文革史上没留下什么足迹。由此可见，很多争论问题依赖于史实的认定。

又如运动初期大城市中的学校，经历了“五十天”的工作组时期、红卫兵运动时期，以及以后的批判工作组，继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1967年初夺权诸阶段。但是对于全国大多数地区而言，运动并未依照这一“五十天”模式进行。在文革初期的七、八月间，全国逾百万的中小学教师被关进各县办的“教师集训会”里划分左中右，遭受政治迫害和肉体上的折磨。毛泽东批判“五十天”以后，也未得到解救。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们是“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革命学生”，而且这些集训会也未必都是按照刘少奇指示办的。很多文革工作队是地方党委按照政治运动一贯做法派出的，还有一些是原来的四清工作队转成的。10月举行的中央全会在关于小学的材料中仍然说“小学教师的队伍严重不纯，领导权被敌人篡夺”，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以后，他们也未立刻得到解脱。特别是其中一些被划为“四类”的少数教师，又被编入“教师集训队”，强迫劳动并被批斗。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群众动员深度和广度的加强，一些教师起来造反，到了1967年1月前后，才由各个县委宣布这批教师平反。（见拙著《文革初期的中小学教师集训——以陕西省为例》，《昨天》，2012年11期）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命运，也是所有文革史著作中的缺项。从这个例子也可看出，将文革初期的学校工作队问题归纳为毛、刘两条路线之争并不准确。

此外，很少为人所知的是，在地级及地级以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对“大跃进”的批判占了主要成分。文革史研究者余习广先生专门搜集文革揭发材料。他说，在文革初期，凡揭发大跃进中惨案的大字报，即被视为“反党”，作者遭到迫害。但是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时期，这种揭发大跃进时“五风”的材料和大字报大量涌

现，占他搜集的2106份材料的58%，说明这类批判已经合法化。1966年12月以后，有一些知情干部造反，揭发了许多大跃进时期的内幕，在328份“知情人”的揭发材料中，有63.7%的涉及到大跃进的“苦日子年代”，对于一些地方领导人造成大饥荒和大灾难责任的指斥和追究，并透露一些地区饥荒时期的死亡人数（余习广《关于“文革”研究想说的几句话》，猫眼看人，2007）。余习广的定量数据值得重视，因为它有很大的基数，有可靠的统计意义。

在“大跃进”及以后年代的饥荒里，由于县领导干部的过失，安徽省无为县饿死将近30万人，约为当时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文革开始时，愤怒的群众将这位县委书记关在铁笼子里游街。关铁笼子是怕他被打死的安全措施。2014年8月，因为桐城电视台在播送节目中赞扬这位县委书记，在无为网上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暴，网民纷纷指责该电视台颠倒黑白、伪造历史。从他们激昂的情绪可以设想半个世纪前的文革初期，人们是如何发动起来，把矛头指向那些无良干部的情景（《严正抗议姚奎甲之子颠倒黑白歪曲历史！》及跟贴，《无为网》，2014年8月3日）。

再说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有两个样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和陈伯达的小站经验。文革前后，对这两个案子的评价随相关领导人的命运起伏而大起大落。我于1969年在当地听小站“四清”积极分子鄧玉娥报告，控诉在“四清”运动中被打为反革命的张凤琴的时候，所述内容都是在“大跃进”中弄虚作假的事例，和公开宣传的“小站经验”揭露内容完全不同。所以，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是大跃进中的左倾路线问题，一些干部的行为也很恶劣，有民愤。但是“四清”运动划了一条1963年的政策界线，不清此前的问题，毛、刘关于“四清”争论的内容也不涉及这样的实质问题。这些问题在文革开始后集中爆发出来。

我于1965年参加过一届农村“四清”工作队。当时已发布“二十三条”，并明确刘少奇修改过的“后十条”不再适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上，进村后工作队完全夺了权，王光美倡导的“扎根串连”依然继续执行，我们队员首先干的就是这件事。“后十条”中对地富子女的歧视政策在实际运用中也有增无减。所以，上层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与底层实际进行的运动似乎关系不大，中共历来政治运动中奉行的一些“潜规则”在起着决定作用。

我说的底层也不限于工农，“黑五类”或“黑六类”早沦为贱民阶层。天津在1966年“红八月”中，铁路一中的红卫兵突然包围并占领了市工商联、民建的机关大院，扣押了所有在场的人员。天津工商联全体成员被红卫兵当场群殴。年届七旬的副主任委员、“面粉大王”孙冰如倒地毙命。秘书长车重远被枪托捣中心口，当场猝死。主任王光英因体格健硕仅以身免。这件悲惨事件至今找不到任何记述，具体日期也查不到。倘不是清华校友陈中平先生揭露此事（《穿过历史的急流险滩——回顾文革引起的反思》，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这件惨案将在历史记忆中被永远埋没。陈中平先生还揭发同一时期发生在天津的另一惨案：天津十六中教师范景娥，就因为丈夫是曹锟后裔，“在抄家狂潮中，她家附近的中学红卫兵打上门来‘索命’，当着十来岁小儿子的面，把家中四口中老年妇女（包括一名老保姆）全部狂殴至死。”丈夫被关押在单位得以保全。我查该校网站，皆对此案语焉不详，似有难言之隐，更遑论追究凶手责任了。

与这两事件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天津三轮二社事件。也在同一时期，因为风传该社支部书记陈良谋是汪精卫时代的“汉奸”，身负七条人命，在8月29日的职工代表大会上，部分工人将其和一些其他干部抓捕关押。陈良谋在批斗会上被工人和中学生红卫兵殴打，于9月1日死亡。事后市委很快指示法院以“反革命报复罪”判处12名“打人凶手”死刑和有期

徒刑，还就此事大做文章，组织2400个单位、49万多人到该社追悼陈并封其为烈士。至今每逢年节仍组织青少年进行悼念，显示文革中只有党政干部遭难，将这种伪造的文革历史普及到下一代。

一般知识分子也早已成为弱势群体，所以这个底层问题不仅存在于农村。例如北大四清运动开始于1964年10月，当时中宣部派以张磐石为首的工作队进驻，发动群众、贯彻阶级路线，不久就得出北大党委烂掉的结论。到了1965年初，“二十三条”公布，刘少奇不再负责“四清”运动，北大“四清”大翻盘，陆平等校领导参加工作队，反过来整“四清”积极分子。彭真、蒋南翔等均发表谈话，强调“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这一事件导致了后来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这段耳熟能详的历史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悲惨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和我同一毕业论文导师的下一届校友、香港科技大学葛惟昆教授回忆（《悼念我的同学陈一谥》，共识网），在1965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前夕，驻系“四清”工作组宣布有14名应届毕业生不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在会上当场宣布了其中四个人的名字予以公开羞辱。他们还改变了原定的分配方案，把这几名最优秀的学生分配至偏远而且专业不对口单位，其中也包括现在的解思深院士。他和葛惟昆经历了一段悲惨经历以后凭自身努力都对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件事发生在北大“四清”翻盘之后，说明尽管上层斗得天昏地暗，不管谁取胜，下层老百姓的命运依然。老百姓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和其中某一派联系起来。

文革后期的1973年底有一个“反回潮”的运动。“这阵风一来，足有七、八级。北大、清华身居‘六厂二校’的荣誉行列，属毛主席亲自抓的点，自然就是风暴的中心。历史系，尤其是老罗所在的世界史专业，‘反回潮’格外起劲儿。一来二去，从‘反回潮’开始，战果扩大，挖出一个‘小集团’，老罗是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老罗是历史系讲师荣渠、著名历史学家。在物理系，也挖出一个由三名青年教师组成的“小集团”，其中也包括一名现在的院士。他们经常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并聚集在一起议论时政，被揭发批判。所以，“1973年的‘反右倾回潮’，在北大，也是一场几乎等同1966年的政治风暴，对此知之者不多。”（郝斌《“牛棚”内外忆老罗（荣渠）》，五柳村，2005）

再说1972年10月在北京有个天安门挖花事件。事后，周恩来强调是阶级敌人破坏，要求严厉查处。北京市公安局随即拘留了一批无辜市民，内有许多未必去过天安门的老大娘，因找不出任何故意破坏活动的证据，关押了一段只得释放。这捕人之事至今不见任何资料记录，因我有朋友的母亲在内所以知道。普通老百姓命运就是如此，如蝼蚁一般。

在这不同的视角下，毛泽东和刘少奇两条路线的对立、“四人帮”的作用，也许没大家所理解的那么重要。官民矛盾贯彻文革始终。我们需要一部文革史来记述人民在这一期间所遭受到种种苦难和他们如何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斗争。

三、社会发展模式

毛和刘的分歧，或者泛言体制内的矛盾和纷争，虽然没有想象的那样重要，不能当作文革史的主线，但是文革的发起却与此大有关系，涉及宏观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当我们从宏观角度讨论文革时，不免牵涉到更高层次甚至哲学层面的问题，对文革历史的讨论必然会促进我们对世界、对历史整体认识水平的提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抛弃一些传统的观念，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我们看作为当代科学支柱的现代物理学的进

展，不也是摒弃了以太、同时性、物质不可入性、物质无限可分性这些传统观念而取得突破吗？

首先是社会发展模式问题。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建立了一个一维价值判断坐标，将个人、社会集团、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意识形态诸元素在这个坐标上排列，标志为先进的、革命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先进代表，在先进思想的启发和指导下，按照某种既定的蓝图，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或改革，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观就是如此。现在的自由主义人士也难于脱离这个樊篱。他们认为，只有在他们尊崇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带领下的社会运动才有所谓积极意义。而且他们倡导的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模式，万万不可走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这条路。

这确实是一种社会进步模式，但不一定能概括所有社会进步模式，更不能概括所有历史发展环节。历史进程很难制式化，价值判断体系没有公认的一维标准。所以我们必须摒弃好/坏二元论的思维习惯，承认很好的东西和很坏的东西常常容于一体或溶于一体。二者经常是相辅相成的，才能理解历史真谛。任何时代有黑暗也有光明。这光明也不能仅限于遇罗克等少数人。特别是文革这种极端的年代，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说的那几句话一样，是个自身矛盾的时代，是思想禁锢的时代，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

孙怒涛先生也反对这样的一维价值判断体系。他在《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的封底上说：“在清华文革初期的政治光谱中，蒯大富在我的左边，沈如槐在我的右边，我居二者间。在蒯大富的左边是刘才堂，在沈如槐的右边是周泉樱。与我站在同一点的是汲鹏，以及我们后面的‘天安门纵队’和‘三七战团’。很遗憾，左，并不代表正确；右，也不代表正确。左与右的中间点，同样不代表正确。他们离正确都相距甚远。”

举一个例子是坚冰如何打破。中共凭枪杆子起家，从“支部建在连上”开始的社会改造工程将整个中国打造成严密组织的铁桶江山。人们生活在这个专政体制中，食于斯，居于斯，“党给了我一切”，一辈子前程连老婆孩子，都押宝似的押在这里了，不敢有任何逾越，哪怕是“私字一闪念”也要“狠斗”。就是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年代，人们也服服帖帖，叫咱死咱就死。而且，还有很多群众被强权绑架日久，患上了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候群，不但屈服于强权，而且对强权产生了崇拜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以暴力对付更弱的群体。在1967年的湘南大屠杀中，直接下手虐杀四类分子的，不都是些衣不蔽体的穷苦农民么？

显然，这样的铁桶江山，只能靠内部的裂痕来打破。统治阶级越是感到这种铁桶江山的牢靠和无虞，就越热衷于内斗。陈行之在《一个王朝的末日镜像》（五柳村，2013）中分析了元朝灭亡的原因。他说：“统治集团的内部权斗松懈了国家机器的坚韧度，国家意志在传导过程中被耗损，从而在上层统治层面为国家溃解准备了条件。专制主义的本性是社会控制和社会掠夺，这种控制和掠夺必然会在统治者内部产生严重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纷争（即所谓强盗团伙的分赃不均），换一句话说，凡是专制主义立足的地方，上层权力斗争都将如影相随，贯穿始终。虽然我们很乐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概括中国历史，但是只要我们瞩目历史叙述，就会发现，至少在初始阶段，它首先表现为宫廷斗争史，作为宫廷斗争的社会结果，才表现为底层民众揭竿而起，轰轰烈烈地登上历史舞台（你只要看一看‘二十四史’中对宫廷斗争浩如烟海的记述就可以了），这在古往今来都是一样。”

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爆发缘起于两起事件：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清华附中学生组织的红卫兵。这两起看似突然发生的事件分别在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上打开了缺口。

这两事件完全是在体制内发生的。聂大字报的作者是北大“四清左派”。回顾北大四清，斗争最激烈的有三个系：哲学系、经济系和技术物理系。仔细分析当时双方的意见，你看不到任何原则分歧，每一方都争着表现比对方更左。当时校长陆平想整哲学家冯定，几个哲学系“左派”就拥护冯定，并写好了辩论文章。后来毛泽东说冯不好，叫这几个“左派”知道了，赶忙连夜写了批判冯的文章发表争取主动。（郭罗基《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智识学术网，2005）所以，从四清到聂的大字报，完全是党内派系的斗争。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后，赶来处理此事的李雪峰等立刻敏锐地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严重性不在于大字报的内容，而在于这种公开形式。他们在北大干部会上说的，对聂本人交待的，都是在强调此事：内外有别。他们知道，发展下去，局面将无法控制，混乱将从体制内向体制外蔓延。后来的事实发展证实了他们的忧虑。

以大字报为载体的言论自由很快发展到出版自由。“群众报刊是文革的一个‘神话’。”“谁都不会想到，在1960年代中国大陆的天空下，群众组织（哪怕只有三两个人）可以创办报刊；更没有想到，1966年9月—1968年底，红卫兵、造反派群众组织创办了数以万计的大量报刊。”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接见首都三司负责人时，有红卫兵问，“自己可以办报吗？”周回答“自己印报可以嘛！”据说地院《东方红》销量达10万份以上。（胡庄子《毛泽东与红卫兵报刊》，《昨天——2012年〈昨天〉精选》，何蜀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在文革以前，“非组织活动”是极端忌讳的行为。即使几个朋友经常在家里吃吃喝喝，也被认作是“反革命小集团”予以取缔。在体制内部“组织原则高于政治原则”是所有老干部严格遵循的信条。但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打破了这个非常严格的传统禁忌。

作为两个突破点，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看不到任何先进的因素。而遇罗克的思想，已经接近现代的平等意识了。但是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事件中，遇罗克虽然是黑暗中的明灯，但没有起到这种“第一推动力”的作用。

“可是，历史的怪异之处在于，文革中首先发难，对这种体制‘阴暗面’进行造反的人，不是那些在这个体制‘阴暗面’下被压制的真正受害者，而是这种体制的实际受益者，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只有他们是‘自己人’，才有说话的资格。”（陆小宝《找回自身的庄严》，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陆小宝所说历史“怪异之处”可能就是历史进步机制的精巧之处。

当然，这两事件取得突破性作用的关键还是伟大领袖的钦点，以后继起的造反运动也一样。这正是很多人认为造反运动无任何积极意义的原因。但是，正如林伟然所说：“打开这一死结的唯一办法是来自于人民所服从的权威人士的号召，号召人们起来造权威的反。”（《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1996）这当然是针对当时国内局面说的，不能当作普遍真理。

所以实际的造反运动是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开展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如果它提出的目标过于激进，群众将不敢参加，也会很快被官方取缔；如果它的目标过低，将不能动员广大群众。所以它的形成和开展过程类似于生物界的自然选择过程，也近于哈耶克所说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如果不考虑具体历史环境，抽象地谈论造反运动和造反派的优劣得失是没有意义的。

有人说，文革中的民主自由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真正的”了。朱学勤先生把文革比作法国大革命，我却认为，比作欧洲的宗教改革更为恰当。我们在学校里学历史的时候，被告知宗教改革者代表先进势力，为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通俗历史读物《宽容》（房龙著，吴奕俊、陈丽丽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却告诉我们，旧教是一座监狱，新教是另一座监狱，并不比旧监狱更好，但是在两座监狱之间有一些空地，容许自由思想的传播。有人问我，文革中的“空地”究竟在哪里？这本是一种比喻，但是一定要问，我的回答是，就在《解放军报》印刷厂，因为登载遇罗克的《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就是在那里印刷的。这在文革前和文革后是不可思议的。

（未完待续）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 【微观历史】

### 第一次斗“黑帮”

• 冯敬兰 •

师大女附中的领导班子是跟随“旧北京市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还是“反革命黑帮”？对他们斗还是不斗？

这个问题纠结着胡启立和工作组。

1966年6月19日，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西城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的胡启立，在女附中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是肯定师大女附中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展是好的。二是提出学校文化革命的方向问题，进行了三个揭发（前市委修正主义黑线，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党内领导核心内的代表人物），主攻方向是清理党的领导核心。他说，同学们揭发了卞仲耘、胡志涛，她们是要检讨的，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是要经过艰苦努力的，前北京市委在女附中的影响不是轻的而是重的，比如追求升学率，砍掉政治活动等等。三是最近一些同学、教师给工作组提意见，监督批评工作组，我们是欢迎的，否则工作组就无法把工作进行到底。

可以看出，作为工作组的直接上级，胡启立不同意对卞仲耘、胡志涛等主要校领导召开全校的批判斗争大会。他认为条件并不成熟，已经揭发出来的问题，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去弄清楚。

6月20日晚，因给工作组贴大字报遭到大批同学围攻了三天的高三4班13人到团中央去质问胡启立，为什么让工作组煽动同学围攻她们？胡不得不承认她们是真正的左派。同一天，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2个高中学生给江青写了充满革命豪情的信并附上控告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材料。信中说“从现我校及别的一些学校情况看，有很多理由猜测：这是一个新的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反对文革、反党的阴谋……而且我们更焦急、更深切地感到毒蛇就在主席身边。”梁二同的政治视野显然已经超越了自己的班级、自己的学校。



其实，6月13日工作组已经开过一次全校揭批大会，揭发出来的大抵是些执行错误路线的问题。按照部分激进师生的说法，发言人经事先指定，内容不痛不痒，属于让校领导“蒙混过关”之举，工作组大有与校领导沆瀣一气的嫌疑。

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长期在北京休病假的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袁淑娥因婚姻破裂迁怒于卞仲耘，诬陷卞仲耘和她前夫有不正当关系，写了万言书上告，对卞仲耘从方方面面进行“检举揭发”，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市、西城区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打印的告状信在6月中旬转到了工作组手里。二是管人事档案的一位职员贴出小字报，揭发卞仲耘的入党介绍人是“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刘仁，她由此认为卞是假党员。两个人的突然出现，两条莫须有的罪名，立即致卞仲耘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急于摆脱困境的工作组，以为组织一次全校规模揭批大会的时机到了。此前胡启立来校的讲话中，强调过大字报不要写私生活和男女关系，不要写政治历史问题，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形势急转直下，他的“两不要”，竟然成为打倒卞仲耘的两根大棒。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宣布“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在讲话中说，“进校18天了，学校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昨天我们对工作进行了群众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将运动推入一个新的高潮。”他宣布，当天下午2：30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

刘进多年后回想那天的事情，仍旧表示不解，工作组一直按兵不动，强调要继续揭发，事先毫无迹象、毫无准备的前提下，怎么突然提出要召开全校批判大会呢？她只能猜想，一定是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了工作组手里，提供了“炮弹”。可是她从来没有见过那封告状信。作为学生代表会主席，运动以来，刘进一直跟着工作组忙忙碌碌，尽管她家与学校仅一路之隔，她也很少回家，夜晚经常和衣睡在教室前面的木讲台上。其实张世栋一周前就看到了万言书，他没有让刘进她们传阅。袁淑娥也来找过学校，或许是她的“悲情”动摇了工作组？总之，告状信有胜于无。工作组再不召开全校大会，明摆着将置自己于非常被动的地步。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全校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在大操场召开。当年的操场很简陋，沙土地，坐北朝南有个不大的水泥砌的台子。各班学生自己带椅子排队进场，火辣辣的太阳下，坐上一会儿就得心烦意乱。当时卞仲耘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身后是手持木枪（体育课用的体操器械）的高三学生，专门挑出来的几个“贫下中农子弟”。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也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头天晚上在团中央，胡启立当面承认她们是革命左派，而现在她们显然被当做了右派学生。看起来工作组正在满足她们斗“黑帮”的诉求，然而此刻对她们的羞辱，只能让她们和工作组彻底决裂。

大会开始，卞仲耘首先作了检查，然后由群众揭发批判。

袁淑娥闻讯赶来参加批斗会，还带着儿子、弟弟和母亲。据说工作组不允许她参加，但是聚集在心中发酵的愤怒和怨恨，给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力量。她第一个登台发言，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乍一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D先生的一张合影。其实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他们曾互为朋友，袁淑娥进城会住在卞校长家，D先生也邀请卞校长夫妇去军营参观。现在反目成仇。四人合影，剪去两边的人，恰巧就成了卞和D的合影。她拿照片当证据，指控卞仲耘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动情处声泪俱下。除了揭发卞“乱

搞男女关系”之外，也做了政治揭批，譬如卞过去曾对她说过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话，她顺便还给卞扣上“漏网大右派”的帽子。随后，袁淑娥又叫儿子（小学生）上台念发言稿，控诉卞要“谋害”他的妈妈，袁的弟弟（高中学生）也跳上台按压卞仲耘的头。台下，学生群情激愤，振臂高呼口号，场面一度失控。卞仲耘身后手持木枪的学生，你一枪、我一枪就把她捅倒了。年届五旬的卞仲耘，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平时身体就不好，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暴力？站在台下陪斗的四位校领导也一直被强迫低头弯腰，太阳暴晒下难以坚持。袁的发言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学生的愤怒情绪一波又一波。除了袁淑娥，还有六七位师生代表上台发言。

最后，工作组做了小结，认为“卞仲耘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揭发，是非常严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她的检查根本不是检查，她想蒙混过关，想滑过去。我们绝不能让她滑过去！为了彻底清算她的罪行，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的职。为了彻底弄清楚，为了清算她，我们要开大会，继续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的主要矛头是牛鬼蛇神，不是同学们，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6月22日下午，批斗会继续，卞校长再次遭遇殴打折磨。后来她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当时还有地方“伸冤”，信息的传递也是畅通的。卞仲耘详述了批斗会上的遭遇：

第二天（6月22日——笔者注）清早我没有吃早饭，就到了学校。上午写检查，中午只带了一块小饼，因为行动不便，也没有吃午饭。下午一点半，继续开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全校师生员工一千八百多人。由于袁淑娥等人大肆造谣污蔑，蛊惑欺骗，煽风点火，相当一部分群众都信以为真，以为我真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万恶的“黑帮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了。这次会上的发言，大都集中火力，揭发“事实”（例如：把学校的各种备战措施都说成是我配合前市委修正主义黑帮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逼我承认、交代现行反革命活动。在群情激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种种折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话，没有过的思想和意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能承认。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台上发言的人揭发得越是激昂慷慨，要我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坚决不承认，就被打被辱骂得越厉害。我从五八年起就不断患病，几度长期住院，动过手术，现在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等症，在这次被打的前几天，在北京饭店医务室检查，血压是高压180，低压110。突然遭受这样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滴水没有进口，脸上身上汗流如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一再瘫倒，甚至晕倒在地上。这时，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头上浇，用手揪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拖起来，还叫恢复原来的姿势。像这样，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共有三、四次。当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样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拍了照片，大概还不只拍了一张。等到把我折磨够了，天快黑了，会快结束了，那个阴险恶毒的坏家伙袁淑娥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还不够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头发，我对这个可耻的家伙进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蛊惑、利用的学生们不要再打我了，说光打不解决问题，一方面更加阴险恶毒地煽动大家对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继续进行“揭发”，以便证明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斗争大会一直开到七点多钟才结束。

散会以后，工作组的同志看我被弄得实在不像人样了，可能为了避免这样走到外面去影响不好，就叫我洗了脸，还拿了一件塑料雨衣叫我穿在身上，罩住我那一身被弄得龌龊不堪，而且被撕破了的衣服。最后，有一群学生送我回家。这些学生相信我真的是“黑帮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所以对我恨极了。在路上和公共汽车上，有的学生继续辱骂

我，往我身上吐唾沫，并对我说：“你回家以后不许自杀！”公共汽车上有些乘客见到这种情形，表示很吃惊。回家以后，脱下衣服一看，我被打得遍体伤痕累累。右臂上部有整整一大段被打得全变成紫黑色，肿得很厉害，整个背部都被枪口捅得皮破肉烂，全身都有伤痕。

2006年2月，张世栋在接受刘进、宋彬彬的访谈中提到，会前他去团中央开工作组组长会，当时胡克实（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严肃地说：“如果发生武斗，你们一定要挺身而出，坚决制止！”他赶回学校时，批斗会正在进行。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他立即予以制止。散会以后，张世栋还给卞仲耘披上风衣（卞上文提到是塑料雨衣），送她走了一段路，劝她要想得开，要正确对待。

罗治笔记如此记录张世栋的讲话：“今天大家很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支持的，因为她有罪恶。打她几下是不对的，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消灭她。为了继续斗争，要好好准备炮弹继续打，提高警惕，准备全歼，取得最后的胜利！要好好贯彻党的政策。……光荣、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

6月23日，袁淑娥带领五个学生，去卞校长住处进行“调查材料”和“发动群众”的活动。她还动员和撺掇卞家从前的保姆去学校揭发和控诉，遭到拒绝。6月24日上午，女附中的学生一批又一批来到卞家所在的宿舍楼搜集材料，把大字报贴在大门上和楼道上。自由制片人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提供了大字报的内容，全部是粗野的谩骂和人身侮辱。

这次历时两个半天、针对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的批斗大会，是工作组驻校50多天里唯一的一次。我们尚可看到卞校长亲述，她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和侮辱。44天后，工作组撤离后的校园，更加无法无天，由高一3班学生发起对卞校长等5位校领导的游斗中，她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我们再也听不到她的控诉。

时隔48年，在今年年初由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引起的舆论大战中，袁淑娥的名字再次被提起。年青一代能否想象，以革命的名义，一桩普通离婚案能产生多么巨大的杀伤力？

今年早些时候，在母校“老三届学生和老师见面会”上我见到了袁淑娥的前夫D老师。早就听说D老师相貌英俊，像电影明星，果然，耄耋之年的老先生，身板笔直，五官清癯，颇有绅士风度。我们自然会说起文革，说起袁淑娥，D老师管前妻叫“袁氏”。虽然他们离婚已半个世纪，说起袁氏，D老师的憎恨依旧。一个变质的婚姻，不仅让双方成为一世的仇人，还波及到另一个无辜的家庭，造成卞校长家破人亡。D老师说，他和“袁氏”是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同学，D学英语袁学俄语。毕业后“袁氏”留校，D参加志愿军赴朝。1954年两人结婚。当时的“袁氏”应该是优秀的，否则不会留校。当时的D更是青年才俊，志愿军中年轻的翻译。我没有插话问，后来“袁氏”怎么成为大连工学院的俄语教员，而D回到了北京？或许是长期的两地分居，或许是夫妻间常见的误解，让他们在十年中积累了太多的怀疑、厌恶和憎恨，用D老师的话说，他们的婚姻早已破裂。

袁淑娥与卞校长1958年同住一所医院而相识，后来彼此好感成为朋友。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正在北京空军某部的D也有转业来女附中教书的意愿，于是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集体讨论通过，D于1963年初调入女附中。做过D老师学生的校友都记得，那时候的D老师，五官俊朗、真是一表人才。

按说，D老师转业到一所著名女中，事业、家庭都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他们修补婚姻也有了条件保证。然而两人还是照常争吵，卞校长多次调解无效，渐渐也失去了信心。来到学校一年后，D老师提出离婚，“袁氏”的态度是宁可拖死，也不离。D起诉到法院，19

64年8月被判决离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多扣D的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学校不能擅自更改。“袁氏”认为，卞明显地站在男方一边，因此一再被激怒。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把所有的个人怨恨都换成政治面孔，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展示出登峰造极的恶毒，直到8月5日卞校长被学生殴打折磨不幸遇难。

胡志涛校长对袁淑娥参加学校的批斗会十分不满，为此曾质问过工作组。她表示，卞仲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生活上没有问题。

（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后西城区检察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决定不予起诉。卞校长丈夫王晶珪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诉，同时也获得很多支持，但始终没有结果。1989年全国最高检察院明确表态，支持西城区检察院的处理结论。）

我听D老师说，袁淑娥还健在，那也是耄耋老人了。在文革中，像她那样，扭曲的心理、偏狭的报复心，嫉妒和仇恨，不知造成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文革浩劫的人性基础，至今依然雄厚。

□ 来源：冯敬兰：《我的文革纪事》之六

~~~~~

【往事非烟】

冀朝铸回忆录（摘译之一）

• 冀朝铸 •

（本文摘译自：Ji Chaozhu: The Man on Mao's Right）

◇ 初会毛泽东

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摆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

我匆匆拿了一些尚未清洗的替换服以及一张和向同（译按：冀的妻子）合影的照片，便被推进了车。汽车绝尘而去，只见两旁是弯下身作活的农民。我没有向司机询问原因，司机也没有说话。这是有其道理的。我们的规律非常严格，因为我的动向很可能被利用，以知悉周总理的行踪。我从不对外人透露我的工作，即使向同也知得极少。她知得愈少，麻烦也愈少。

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不管怎样，我不能像刚从稻草堆上爬下来的样子出现在工作的地方。

汽车高速驶到我住所的空地停下。我立即飞奔入我的简陋的房屋，脱下我的田地衣裳，换上较为整齐的衣服鞋袜。向同不在家里。我倒出热水瓶的水，清洁手和面，以及擦去脸上

的泥屑。我梳理好头发，并再三检查我没有连衣架都穿在外衣里，而左右鞋子都属同一对。
（译按：冀以前曾摆过这样的乌龙。）

车子风驰电掣的驶过市区。它拐了一个弯以避免麇集在闹市道路准备游行的人群。我收到一些简单的指示，不久便发觉自己身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是我很久以前遥望毛泽东所在的地方，俯视着天安门广场。广场现在是沸腾着上百万的人群，数以万计的红旗在招展着。大批军队正在队列而过，连同各种各样的兵器和辎重。群众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在城楼上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著名人物：苏联的赫鲁晓夫、北韓的金日成，以及华沙公约国的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和众多宾客在天安门塔楼前的平台上互相交换客套话语。

天安门是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那时我在哈佛。当我读到他的讲词时。我两眼充满喜悦的泪光。毛说我们站起来了，我们的国家不再受人欺凌和侮辱了。

而现在，穿著灰蓝色中山装的毛泽东真人，却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站在栏杆后面，向着看不尽像海洋一样的人群安祥地挥手。在城楼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陈毅、毛的继承人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以及许多早期参加斗争而现在是国家领导人的老革命。

这些都是现代中国的创建者，都是重要的人物，我不由心里忐忑。但是，我不容许自己被紧张克服。是工作的时候了，或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到了。

我的任务是，和几个同僚一起，协助我们的领导人和说英语的嘉宾交谈。我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以及避免引生误会或惹出乱子。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做翻译，不是呆头呆脑的看客。于是我和往常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说洋话的娃娃。我站在中国主人的右面，隔在主人和宾客之间。这是中国的传统，比如在宴席之中，客人总是坐在主人的右面。

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一——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

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

“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能。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

◇ 大跃进与毛周关系

到了1961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闹饥荒。我们把原因归咎于干旱，这只是部分正确而已。加拿大送来了小麦。即使美国也表达了人道的关注。（当时美国仍然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在外交上也敌视中国。）联邦法庭的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以显示美国人“有清明的良知，而且古道热肠。”他是对的，但可惜这个建议没人附和，因而失去了一个和中国沟通的机会。但是，即使肯尼地总统和一些美国私人团体愿意提供援助，恐怕中国也不会公开、直接地加以接受，因为这会使毛泽东——造成饥荒的人——更加失面子。

为了减少城市粮食压力，二千五百万人被令离开城市迁移到农村去。大跃进时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比解放初期多了五千万人。

在有些地方，当地的军人向市民下手，成为抢匪，而非保护人民的人。中国正在分解，而虽然毛主席向党的其他领导人宣布去位，退居“二线”，但是他清楚表示，他期望这些领导人按他的“思想”去管理国家。这意思是“继续革命”和“痛打落水狗”的政策不改。

我们的高层领导人多次下乡调查，亲自看看情况差得怎样。静静地，而且勇敢地（因为有违毛泽东的政策），他们进行了一些改革。农民分配到一些土地，以耕种粮食。全民大炼钢停止了，而公社食堂也无声结束。透过层层乌云，一丝实用主义破绽而出。

但对彭德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无情镇压，却对当时政治气氛注入了毒素。从此，再没有人敢对毛泽东的“智能”，无论是过去的或现在的，说三道四或提出公开的质疑。

毛泽东是转换命题的大师，特别是当他辩论失败的时候。现在他要发起一个新的群众运动，目的是铲除封建的物质残余。这意味有系统地拆除古城墙，包括北京的万里长城。我们在外交部的一些人被发动起来参与此事，组织一个工作组用铁锤和铁锄去“对付”那巨大的石块。

万里长城是千年前用砖和水泥混和糯米浆而成，其意是永垂千秋。许多石块上刻着记号，说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所造，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之物。这对我一个喜爱古物的人，真是心碎的事情。大部分的砖都打碎了，而较为完整的则运走作为建造厕所或猪舍的材料。

侥幸的是，领导人之中有些还是头脑清醒的，特别是邓小平——一个老革命，当时的总书记。他反对拆除古墙。他当时在南京，南京有着中国最美丽和最完整建于五百年前的城墙。邓静悄悄地反抗毛泽东的命令，他发出指示严禁任何人触动城墙。南京城墙因此今天仍是耸立着，但所有其他的城墙，包括好些其他难以弥补的古物，都差不多打掉了。

比毁坏物质遗产还可怕的是，对政府和党的各级官员的谴责，而这些官员都是匡补大跃进所引生的问题的人。他们成为毛泽东的打手所恶毒攻击的目标，这些打手乘机利用这个机会打倒政敌和夺权。

1962年初，在一个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就大跃进和公社运动作一个不愠不火、毫无诚意的自我批评。他对引致千万人死亡和亿万人痛苦毫不表示悔意。他着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承认错误。于是，所有人都奉命自责，包括周总理。

许多外国的历史学家都不能理解中国这时的气氛。他们经常引周总理，认为他对毛主席过份臣服。但我经常和周总理在一起，并时常见到这两个人在一块。我觉得他们的关系远比

所谓“臣服”为复杂。在外国宾客离去后他们有空坐下时，从任何角度看他们都像两个老战友一样，说说笑话或讲讲旧事。我从没听过他们彼此间有尖酸的语言。

接着以后的十数年，毛把许多和他一起打江山的老同志加以惩罚或消灭，因为这些人或真或假地要取代他，又或这些人要把中国带到一个他不愿意见到的地方去。周总理也遭到谴责，但他没有向毛反抗或与反毛的人结盟。他只是对毛的说话唯唯诺诺，而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去做。例如在60年代中期当毛正和苏联抬杠时，周恩来和苏联签订合同共同向北越提供援助，并让苏联利用中国的铁路运送军用器材。当毛知道这事后，他暴跳如雷，但却没有对周采取任何行动。

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周恩来似乎是最少野心和最希望调和的人，不论是在中国内部或对外皆是如此。和谐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所谓“以和为贵”。毛泽东对每一事物都看到矛盾，周恩来却每事追求和谐。周恩来有一个本领，便是在不论什么情况下，他都可以“拆弹”，缓和矛盾，或在非常不可能的情况下找出共同立场。他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宝贵的财富。他是天才的演说家。他有敏捷的头脑，且能善听人言。

国内的政治气氛愈来愈糟。彭德怀元帅发觉（以后其他人也同样发觉），你不必搞阴谋也可招致杀身之祸。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的反应是贬抑爱国者和破坏中国传统，这使我们非常懊恼和丧气，但有谁知道，这只是重头戏的前奏，而这重头戏是一文化大革命。

◇ 文革序幕（上）

大跃进“拨乱反正”后，随着地方官员和农民有更大的自主权，经济不断有所改善。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管理国家大事。这维持到六十年代中期，然后毛泽东又“不甘寂寞”，蠢蠢欲动了。天边乌云开始积聚，暴风雨即将来临，把中国推入了大混乱和大倒退的境界。

党开展了两个新运动，号召干部回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要在农民中培养政治忠诚，而四清运动则要清理政治、经济、组织和思想。当时有愈来愈多的人投诉地方干部贪污舞弊、欺压农民，以及胡乱夸大生产数字。

我在很多年前已被下放农村，喂了一年半的猪，现在是工作排得满满的。但即使如此，在1965年年底，外交部翻译组的领导仍认为我应该再下去，接受农民的锻炼。

一天，翻译组的政委着我回家收拾，准备与组内一些其他的同僚到遥远的湖南作长期的蹲点。政委告诉我们这些翻译，之所以派我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要我们熟习毛主席和刘主席的湖南腔调。

向同正怀着二胎，预产日期是1966年年初。我向政委请求待婴儿出生后才出发。政委严肃地看着我，责备道：“是你的老婆生孩子，又不是你。赶快去！”于是我顺从地和同僚们坐火车出发。我们坐着硬席车厢，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抵达湖南长沙，再转长途车到浏阳县。该县以爆竹业著名。

在我整个蹲点期间，我和最贫穷的农民生活在一起。我改变过几次睡眠的地方，因为屋内的气味令人非常难受。我希望找一个空气可以忍受的地方。原因是当地的习惯是把尿缸放在屋内，让它发酵。在第一个家里，我问户主是否可以把尿缸拿到屋外。

“不，不，不！”他说。“这样会给人偷去的。”他解释说尿是如此宝贵的肥田料，如果放在屋外无人看管的话，是冒很大的风险。我决定睡在马厩里，与马为邻，那里马粪的气味，相对来说，是跟玫瑰花一样香。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发掘贪污，予以铲除。我们鼓励农民举报他们的队长或大队长。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例如突然穿上新衣服或家里有新的家具，便告诉我们。然而，我们毫无所获。

我们不断被要求不要怕苦，并要成为干部的样板，勤勤恳恳地工作。我在1959年已有类似的经验，努力表现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干部。可是在湖南，条件更为艰辛。这里，环境更为肮脏，气味更为难闻，冷天更冻，因为南方的屋一般没有炕或其他保暖的设备，以助度过短而潮湿的冬天。

这里总是下雨，但农民并不理会，照常下田作活。我们不能例外。我自从1959年下放农村后，从那里所得到的经验，使我的革命热情大减。经过几天的湿雨和冰冻后，我们（我的外交部的同僚和我）感到吃不消了，并且认为假设因此患了肺炎而倒下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决定当天气不好时，留在屋里不出去。

临近春节的时候，我们被命令返回北京，以免在农民喜庆的佳节里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如释重负，立即赶回家去，因为向同快要临盆了。我回家的第二天清晨当还在熟睡的时候，向同推醒了我，说她感觉是时候了。于是我们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去，而我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匆匆忙忙地到了人间。这之后我便要返回湖南了。

回程的火车非常挤迫，不幸取暖的设备也坏了。我的咳嗽还没有好，一路上捱着冷，等到抵达省会长沙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竟然瘫倒在我过夜的客店浴室的地板上。我坚持要送往医院。一路上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由于担心在这情况下会说一些“反动”的话，我不断重复说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医生诊断我是严重支气管炎，如果不及时治理的话，可能会发展成为肺炎。我被送到一个单人病房里，留医七日，然后返回生产大队。此时我发觉我们的工作重心改变了，变为清理地方机关，进行阶级斗争。政治口号也不同了，现在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和我的同僚都弄不清这实在是怎么回事，只好按上级的指示去做。

◇ 文革序幕（下）

积压多时的乌云，挟着暴风雨，现在开始侵袭人们。毛泽东对国家的管理方式，愈来愈不满意。到了1965年年底，在他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的私下接触中，他抱怨党的领导人在走“资产阶级的道路”。在12月26日庆祝他七十一岁生日的宴会上，他直接点名批评刘邓，说他们有反马克思思想，并警告要搞斗争以“整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人不把他的当一回事，因为毛泽东年纪已经老迈，而且他已经退到“二线”。

但一些看不见的发展却静静地进行着。毛的妻子江青，（她数年前曾患了癌症）现在成为毛的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江青是神憎鬼厌的人物，认识她的人没有一个说她好话。她疑神疑鬼，凡事要作主。而且眼红别人，野心大，又天真和任性。她许多年前已不是毛的女人，但她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她咬谁便咬谁。

此外，国防部长林彪，另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军事人物，发动起一个空前规模的个人崇拜运动。他把毛的说话编辑起来，称为“毛语录”，又叫“小红书”。这本有红色塑料封皮的书被印行了亿万本。

1966年五月中旬，政治局发出了一个通告，首次攻击那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并号召发起一个伟大的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文化。这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我突然被命令收拾一切，返回北京。在北京，我发觉北京市长彭真被公开抨击。彭是刘少奇和其他高层领导人的亲密盟友。现在我们这些在政府工作的人，已经很清楚看到一场政治大动荡即将发生。

在所有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我都是有惊无险，只受到很温和的攻击，所以这次我也不特别担心。我返回北京后，便立即有任务，陪同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我觉得很奇怪。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说英语，而我们的外交部也不乏说罗语和阿语的人才。过去，在周总理访问非英语国家的期间，我通常留在国内。

在这次外交活动中，我的责任是做笔记。但我的速记是用英语写的，而我的中文书写能力仍相当差劲。我出席周总理的所有正式活动，协助速记员和口译员誊写会议记录。但事实上我的贡献不多，因此我的整个行程就像假期一样。为什么周总理要带我到国外访问？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可能是，因为国内已开始动荡，周总理要保护我。无论如何，当代表团返回北京时，文化大革命已经闹起来了。不久，无数的无辜中国人被杀戮。中国进入黑暗时代。

◇ 无知、愚蠢、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上）

关于文革的个人回忆和官方记录，在图书馆中随处可见。文革发生于1966年8月至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9月其间的十年。在这期间，千百万人死亡，而死亡的人中，不知多少是受虐而死。文化大革命是这么恐怖和不理性，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奇怪，怎么可以发生这些事。当然，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

让事实来说清楚吧。毛泽东从他的半隐居地方回到城市，清除那些妨碍他重新掌权的人，代之以怕马屁者、激烈分子和对他从不说“不”的人。这些人都指望当毛泽东归天时能够霸占权力地位。这次毛泽东又再鼓动群众以助他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的群众不是被饥饿逼迫的农民，而是充满激情的学生。这些学生被纵容可以任意胡为。

公安警察不止被命不要干涉，而且协助学生搞破坏。公安部长谢富治给高级干部发出指令，其中有这样的话：杀了人的红卫兵应该不应该受责？我的意见是如果人死了，就是死了。这不关我们的事。……人民警察应该站在红卫兵的一方。我们要向红卫兵提供地富反右坏的资料。

年青人的狂热和反叛性，加上不受约束的环境，造成极大的荒唐性的悲剧。据估计，在北京每条里弄上，红卫兵（有些只有十三岁）最低限度打死一个人；而杀人事件发生在全国范围里。有学者说：“这是在地球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度里、受到国家政权允许的、在整

个社会出现的『发狂症』。”在街上走着的人，随时可以被截停，盘问他们的背景，并被拷打，即使他们的背景毫无需要隐瞒之处。孩子们出卖父母，工作同僚互相举报，夫妻彼此批评谩骂。

文革最早的受害人之一，是67岁的著名作家老舍。他和二十多名知识分子一道，被扣上红卫兵臂带的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从家中拉出来，集中在一座旧的孔庙里，剃上阴阳头——即一边头发被剃光，另一边则保存。在整个屈辱过程中，老舍和其他人不断被高声喝骂和拳打脚踢。他们面上被涂黑（黑资产阶级分子），戴上牛鬼蛇神的标志，被打倒在地上。当老舍回到家后，他的妻子要把他的衣服剪开才能除下，因为衣服都给凝结的血迹酱死了。医疗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没有医院敢接收他，也没有医生敢医治他。第二天，他挣扎地走到紫禁城附近的一个湖边，投水自杀。

红卫兵是革命的孩子，他们大部分是解放后出生的。在官方的鼓励下，他们开展了自己的革命——为毛泽东奋斗的革命。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大肆破坏和杀人。教师们被枪毙、或生葬，甚或被迫坐在火药上引爆。夫妻被命令互相殴打，有时甚至打死。红卫兵虐待人和杀人的方式，“千奇百怪”，非普通人所能想及。

一句不经意的说话，便足可让红卫兵对被怀疑是资产阶级的人上门抄家，砸烂他们所有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财物，并拷打屋内的人，不论这人是年迈的长者或幼稚的小儿。就这方面来说，可称“一视同仁”，而且被伤害者是“投诉无门”。

我和我的同僚都被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外交部也有同情红卫兵的激烈分子。每人都知道，部内有人已经或可能成为红卫兵攻击的目标。

我对自己担心不大。我倒担心我的父母，他们可能成为斗争的重要目标。我想出一个方法保护他们。此法虽然有风险，但我有信心它能够收效。无论如何，坐着不动风险更大。

这个时候，很多报章刊有毛泽东和宾客交谈的场面，而在两人之间充当翻译的，便是戴着黑边眼镜的我。我站在毛泽东的右边，一个没有名字的翻译员。我把这些图片中的一帧加以放大，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当文革正在闹得乱哄哄的时候，我把这张照片拿下来，挂在我父亲经常坐着的沙发上面一个显著的位置上。

我大声给戴着助听器的父亲说：“你坐在这里，不要动，也不要说什么话。我很快便回来。”说完，我找着街道上的红卫兵代表，“举报”我的父亲。“他是地主阶级，是资本主义分子，”我告诉他，并装得高度拥护文革剿除社会“黑五类”的样子。“他就住在附近，请跟我来，帮我闹革命。”这年轻人中了我的饵。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领着一群个个如狼似虎、准备粉碎一切的学生操向街道尽头我的家。到了家门前，我推开故意不关好的门。（避免要我父亲或母亲来开门。）

当我领着这些红卫兵经过回廊时，一个说：“看这资本主义家具。”说时，他指着一张我父亲读书的已陈旧非常的座椅。我继续带着他们走过大堂，进入起居间，那里我父亲端正地坐着，以困惑的神情透过厚厚的眼镜观望这些陌生人。

一个红卫兵留意到他的藏书。“我们要烧掉这些书，”他说。正当他们要采取行动时，他们一个一个看到我父亲头上挂着的那幅图片，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望着那幅相，又望望戴着黑边眼镜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我。他们的情绪好像左右晃动的悬垂。

“同志，很抱歉，骚扰了你，”红卫兵的头目跟我说，并向我躬身为礼。“我不知道你有这么革命的家庭，请原谅我们。”于是他率队离开，而我也透了一口大气。在返回办公室前，我告诉父亲务必把相片挂在墙上，不要除下。而事实上，文革噩梦还刚开始，无人知道会持续多久。

◇ 无知、愚蠢、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下）

几个星期过去了，又是几个月，疯狂的日子没有结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走到街上，随处可以见到疯狂的痕迹。屋子被搜掠，女人被剃光头，人们面部被涂黑。每人手拿着毛语录，而且要被人看到拿着毛语录，否则后果自负，甚或连累他人。每天早上十时要向“毛主席请示”，晚间则向“毛主席汇报”。接电话的时候，开口要说：“为人民服务”，而对方则回答：“完全地、全心地！”如果你不这样说，红卫兵就可能找上门。

中国成语说：“骑虎难下”。红卫兵是“虎”，毛泽东和他的一帮骑上了“虎”背。这“虎”造成了政府最高层的波动和紊乱。曾经有一次，近千个唱着革命歌曲的红卫兵包围国务院的大门，要求周总理交出刘少奇，以处罚他对毛主席的“不忠”。“老虎”已到了不受驾驭的地步。国务院要求红卫兵离开北京，同时让军队介入。然而，混乱依然继续。

这时，所有小、中、大学都被捣乱了，而且像这个样子持续了许多年。大学教授和学生都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而高等学校只能教授毛泽东著作。在外交部，我们尽己所能和极左派纠缠。我也被命出席一些斗争大会，并逐步被褫夺去一些职务，例如我再不能给毛泽东翻译，虽则仍然可以给周总理服务。外交部的正常活动停顿了，而虽然周总理竭尽所能把我们和政治隔离，我们的外交机器仍是处于半瘫痪状态。一天我回到家里，躺在我小房间的地板上，望着墙上的毛主席挂像，我对他说：“毛主席，你是否疯了？”

在这个乱疯疯的时代，出现的一个讽刺的事件是涉及唐闻生的，我父亲办报时的伙伴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这个当我们住在陋室时给我们送来热水的女孩，现在已完成学业并在外交部工作。由于几年之后我便满四十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翻译员来说，是继续在外交团队里向另一个部门发展或向上升级的年龄，鉴于唐闻生的英语很好，我建议她代替我的位置。

由于她是我通家之好，也是我的同事，我有许多机会跟她谈国家的形势。让我大为懊恼的是，她也变成极左派。我们比较彼此的笔记，然后开始辩论，互揭短长，最后成为争拗。唐闻生不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会伤害许多无辜民众和危害中国的前途。最后，有一天，她控制不了大哭起来。这是我们就这个问题最后一次的谈论。我们的友谊结束了。后来，她进入了毛泽东的内层。当我想到我和她曾有争论，我感觉不安。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约一年后，我收到来自父亲的消息，说他要见我。我到达他家的時候，见他发烧得很厉害，亟须实时医治。他招我走到他的面前，意图说些什么，可是我无法听清楚。我只能不断地点头，并好言安慰他。送他到医院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医院都被红卫兵控制了，他们热衷于在病人中找出“隐藏的反动分子”。我听到有些老年病人在医院中，不止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还被强迫参加斗争大会，完后任其自生自灭。

红卫兵从毛泽东处学到的，是谁的学问愈大，谁便愈反动。在医院里，医生经常被命令洗厕所和擦地板，而护士和杂工则有时做医治病人的工作。翻译部俄罗斯组有一个年轻的革命派，他从没有受过医学训练，有一次在我面前自夸说，他刚给一个病人开了刀：“很容易，很简单！”

如果父亲要死的话，那就死在家里，这比在医院任人宰割或在斗争大会中让人鱼肉为佳。

我尽量在父亲面前显得温柔，掩饰我的不满和愤怒，直至他逝世为止。我父亲为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多，到后来国家竟然对他弃而不顾。在此之前，我已被外交部的造反派指为“保皇党”了，因此我不敢申请放假以照料我父亲的丧事，也不敢戴上黑纱，以免给予造反派口实乘机斗争我这个“腐朽的剥削阶级的”儿子。到最后，由于造反派的作梗，我申请死亡证以殓葬父亲也出了问题。父亲死时官职是中国红十字会山西省分会主席。最后，多得内子向同的奔走，由红十字会发出了死亡证。

◇ 外交风云—丢人现眼的丑剧和闹剧

大约在我父亲过世一星期后，外交部又遭遇到红卫兵另一波的冲击。这次主力是外语学院一群最激烈的学生，他们要“横扫”外交部的所有“保皇派”。鼓动红卫兵搞事的是姚登山，一个中年的外交官员。他在印度尼西亚被驱逐回国，原因是他煽动当地的华人反对政府歧视。

姚登山触犯了所有的外交规则，惹怒了周恩来。但是毛主席和江青（现时已是文革中最有权势地位的人）却公开欢迎他回来。当数以百计的红卫兵包围着外交部的大门，叫嚣着要进来时，我见到姚登山喜形于色。我和并非文革派的同僚决定死守外交部，因为我们知道外交部，像国防部一样，收藏着国家的秘密。一旦红卫兵冲进来的话，凭着他们“打倒一切”的本事，必然造成无可挽救的损失。此外，我们知道红卫兵还怀有其他的目的，便是搜索档案，以找出不利于刘少奇（已倒台的国家主席）、陈毅（当时的外长），以及周总理的数据。

我和其他几百名的外交部人员一道，用身体顶着外交部的大门，不让红卫兵闯入。但我们人数始终吃亏，给他们攻破大门，并冲散了我们。他们一窝蜂的涌进外交部，受到姚登山一伙的欢迎，其中包括唐闻生。我们已无反抗之力，准备任由鱼肉，可是姚登山等人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便是捉拿陈毅，并开会斗争他。陈毅的办公室，和周总理的一起，都在人民大会堂。红卫兵于是重新组织，操往大会堂，而我和我的同僚赶在他们的前头，意图加以阻止。我们手扣着手，在人民大会堂的前面组成人链。红卫兵到达后，高声叫骂，要我们交出陈毅。

在这闹嚷嚷的当儿，大会堂的门突然打开，走出了周恩来总理。他浓密的眉毛交织在一起，面容绷紧，充满怒气，准备和这些学生交锋。他一手叉腰，一手戟指向着学生，眼睛像鹰眼一般锐利，扫过学生的面：“中国是你们管的，还是毛主席管的？你们已经闯进了政府机关，拿走了大批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这些胡作非为只有让敌人高兴。”学生们停下来，交头接耳，声音沉静下来。但是，他们的首领仍是要求交出陈毅。总理双手抱在胸前，两脚迈开，站在门前，斩钉截铁地说：“你要陈毅，便从我的尸体上走过去吧！”

群众平静了下来。他们在想，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接着总理和学生展开了艰辛的谈判。总理同意学生可以开会申述他们的意见，但他会陪同陈毅一起出席。群众选出了代表进入一个大会议室。在这里，总理坐上好几个小时，听学生对陈毅的批判。最后，学生似乎已宣泄完毕，周总理站起来要上厕所。就在这当儿有几个红卫兵冲上台来要抓陈毅。侥幸陈毅的警卫早料到有此一着，迅速把陈毅推到后台去，从后门离开，那里周总理早已准备好一部车子，把陈毅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周总理的声望很高，但极左派总是质疑他的政治资历。他们批评周总理迎合敌人，对帝国主义者过于友善。然而，在官方文件和报纸社论中，周总理都被认为和毛主席、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同样“清白”。利用他的地位和忠于党忠于国家的声誉，周总理在幕后做了很多事保护政府高层官员，包括那些早已被打倒和受虐待的官员。他把一些部长收藏起来，谁也不告诉，包括江青在内，因为江青是专门找麻烦的人。

外交风暴正在酝酿中，姚登山一伙对外国使馆进行攻击，并鼓动极左分子在香港搞事。

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正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象征。红卫兵攻击苏联、印度和缅甸大使馆，其猛烈程度一次比一次厉害。他们聚集在苏使馆门前叫骂，并把苏使馆所在地的使馆街改名为反修路。他们打破了印度使馆的窗户。

由于受到国内事件的鼓励，以及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姚登山，国外使馆的左派也步国内激进分子的后尘。在伦敦，极左派公开示威，高喊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在仰光，左派的使馆职员和警方冲突，造成流血事件。这消息传到北京后，人们群情汹涌，姚登山认为要对缅甸驻京使馆进行报复。

这使我们这些头脑较为冷静的使馆人员大为吃惊，但我们已没有上级可以投报此事。总理去了其他地方“扑火”，不在北京，而外长陈毅和其他副外长都已经成为红卫兵的攻击对象，他们也不敢出头。从上数到下，还可以发号施令的，便只有姚登山了。他的官职是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权力可大可小。我们派出几个人去到他的办事处，要求他叫停学生的行为。

学生攻击外国使馆违反了所有外交规则，并可能被认为是战争行为。历史上，1899年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我们不希望重现。但姚登山不理睬我们，他继续指挥造反派在使馆捣乱。有一个男孩子向他报告，学生开始抢掠。此时姚突然严肃起来，宣布：“不准抢掠！把地方砸乱，但是不准偷抢！”在他的意念里，抢掠属于资本主义行为，而破坏则是革命。

外交风潮在1967年8月达到了高峰。在要求英国归还香港殖民地不遂后，姚登山计划袭击英国在京代办处。红卫兵给予英国代办48小时应允要求，但由于这个要求没有官方正式支持，英方不予理会。香港的文革派早已跑到街头斗争，大陆的激烈分子也已准备好大干一番。在北京，造反派于最后限期届满不获答复后即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攻入英国代办处属地。

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由于我曾极力反对这些疯狂行为，我已被命靠边站了。我现在是无所事事，因此在火烧英办的当天我很早便回家休息。我的家正就在英办附近。我回家不久，便听到人声鼎沸。我见到数以百计的人，冲到英办所在地。我跑出街外，听到的是一浪又一浪的叫嚣声。约在晚上十一时，我见到了火光。我不相信的事竟然发生了。红卫兵放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世界真是疯了！

消防车到来救火，但是给红卫兵阻止了。警察赶来维持秩序，但红卫兵一样不理，甚而加以殴打。这次姚登山是太过份了。红卫兵不只把英代办处捣得一塌糊涂，还因为英代办霍普逊（Hopson）拒绝低头认错而打了他。此外，英代办处的几个职员也受到了攻击。这次不只周恩来大为震怒，连毛主席也干涉了，宣称负责这事的人是反革命分子，应受惩罚。现在政治风向又变改了，这些制造麻烦的人将被清洗。一夜之间，外交部的情况完全改变了。姚

登山及其一伙从“真正的革命派”变为反革命派，而像我那样的“保皇派”却因为顶着这些过火行为而成为“真正的革命派”。

◇ 中美关系的启动（之一）

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因为边境纠纷而变得愈来愈恶劣。苏联对中共的威胁，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美国。但是一些细微的发展，似乎对中国有利。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刚上任，他公开表示有意访问中国。美国解开了本国访问中国的限制。此外，在1969年10月，美国撤走了两艘一直巡逻台湾海峡的驱逐舰。

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一个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瞥见了中国驻华沙代办。他走上前去意图转达一个信息：美国已做好和中国进行严肃谈判的准备。可是我们的怯懦的代办不想和敌人交好，也不知怎样应付这个场面，唯有夺路逃跑，走下了楼梯。代办的翻译避进了洗手间，被斯托塞尔迫及。于是在这个洗手间里，美方代表向中方代表（一个惊惶失措的翻译）传达了影响中美关系的划时代的信息。

为了证明斯托塞尔这个信息是正式的而非他本人一时的狂想，美国国务院在第二天的中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斯托塞尔和中国代表曾有短暂交谈。

不久后，高级副外交部长罗贵波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中国和美国已经展开秘密接触，只有几个人被选派参与此事，我是其中之一。罗贵波说：“你所有其他的责任都要让路给这项工作。从现在起，你要开始阅读所有提供给你的材料。”

由这时开始，我的工作一即利用我的特别技能给政策服务一变为集中在研究政策本身。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仍是总理的一个全职翻译。今天我可能在一个与非洲某国元首的会议中担当翻译，明天要应酬的客人可能是一个欧洲的大使，而后天我可能陪伴总理访问某一亚洲国家。接受了这个任务，意味我要随时候命。我还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透露一点风声，例如我到过哪里或将要到什么地方，包括我的妻子向同在內。

工作小组包括我的韩战老友过家鼎、王海容、（毛泽东的孙侄女）唐闻生和其他少数几个人。领导是章文晋。章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曾在德国留学。他也曾担任周恩来的翻译。

1970年初当美国秘密轰炸柬埔寨以切断北越的援助线之后，中美关系修好的前景变得暗淡，直到下半年才有所改善。该年七月，周总理会见了美国作家斯诺。斯诺是1938年出版的畅销书《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或译《西行漫记》）的作者，此书把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公开在中国版图上，因此他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并被允许访问中国。在北京的乒乓球赛事上，他和周总理并肩而坐欣赏比赛。周问了很多关于美国当前的政治问题。周惊奇地发现斯诺认为美国正要从越战泥潭中抽身而出。美国陷于越战中不能自拔，而这情况的造成正是由于我们对河内的援助，以及我们容许苏联利用我们的铁路运输军用物质给北越。周总理告诉斯诺，虽然来自南方和东方的威胁有所缓和，但来自北方的威胁却没有减少。斯诺问：“哪个较为省力，和苏联谈判修好，还是和美国？”周总理含笑回答：“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周总理的回答令我十分高兴，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及失去了和糟塌了这么多的机会之后，我至爱的两个国家再次找到了共同立场。

隔了一个多月，在庆祝十月一日的国庆典礼上，我被召到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周总理和毛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翻译。一如既往，我站在领导人几步之后候命。我瞧见周总理领着斯诺和他的夫人走向毛主席。我立即趋前给他们传话。毛首先对斯诺和他的夫人表示热情的欢迎，并向他们介绍国庆游行的情况。他接着告诉斯诺庆典完了之后，他想和斯诺多谈几句。

毛泽东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和一个美国人表现亲密，这事本身已经非常耐人寻味。但还叫人更加惊奇的是，一直站在毛、斯两人身旁的林彪元帅，当记者开始按动快门拍摄时，突然一言不发地离开现场。第二天所有中国报纸的头版上都刊登一幅大照片，载着一方是态度安详的毛泽东，一方是满头白发的斯诺，而我则站在他们中间。我因此广为世人所知，包括我童时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在内。

这是历史上头一次，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袖和毛主席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个中国最神圣的地方）而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普通人。

◇ 中美关系的启动（之二）

斯诺过去曾在延安山区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相处了一段时期。他明白这一刻一即与毛泽东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一时刻一的意义。因此他后来写道：“中国领导人在公众场合的一切表现，都是有目的的。”新华社向全世界发放这帧照片，其信息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再清楚没有了：毛主席对发展中美关系有兴趣。但不幸，正如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后来有趣地说：“我们西方迟钝的头脑完全接收不到这个信息。”

被委派了新的任务之后，我不再是毛泽东的主要英语翻译员了——这一角色由唐闻生担负起来。但我仍是周总理的第一英语翻译。斯诺给周做了一个访问，整整用了一个晚上。谈话中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周总理告诉斯诺，中国已准备好和美国讨论美方在保护台湾流亡政府方面的角色。

稍后，毛泽东亲自告诉斯诺，他欢迎尼克松来中国，“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也好，以旅行者的身份亦好。”中国信息是否到了白宫，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我们间接得到了白宫的回应。1970年11月10日，我为周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做翻译。正如所有类似的场合一样，除了我之外，还有记录员和其他的外交部人员，以及叶海亚汗一方的人员。会谈涉及双方有兴趣的问题，其中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当会谈将近结束的时候，叶海亚汗突然说：“我想和总理私下谈谈，希望只有一个翻译在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要求，但总理立即同意了。他指指我：“小冀，跟我来。”

在一个只有我们三人在场、紧闭着门的僻静的会议室里，叶海亚汗说他最近访问了美国，并在美国椭圆形办公室里见过尼克松总统。总统请他向中国转达一个信息。这时，我感到血脉亢张、呼吸紧迫。美国总统要直接给中国总理一个信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尼克松先生委托我告诉中国，美国人认为改善中美关系是必需的，”叶海亚汗说。“此外，总统先生还说美国不会参加任何针对中国的联盟组织。他愿意派遣一个高层密使来北京，讨论所有两国尚待解决的问题，以期最后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

我不知道周总理是怎样保持冷静的。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这好像是梦想成真。就我而言，这是个人问题；而对于周总理来说，我知道他一开始便认为中美应该是盟友。现在总算是有这个可能了。

事隔一个多月后，周总理才作出回答。他的回答是：“中国一向所愿望的，也是经常努力尝试的，是透过和平方式谈判。为了讨论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派遣特使来北京商谈。”周总理还提到了，虽然美国还从不同的渠道传达许多不同的信息，但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国家元首给另外两国国家元首传语。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因此我们对这个口信十分重视。”

最大的公开的突破发生在1971年春天。那时日本正举行国际乒乓球赛事，中国第一次派出队伍往国外比赛。美国队中一个选手在闲谈中，向中国选手表示有兴趣探访北京。周总理获悉此事，他跟毛主席请示此事是否可以进行。毛初时认为不好，但旋即改变他的看法。于是外交部立即发出邀请。中国向美国选手铺了红地毯，“乒乓外交”成为国际媒介的头条新闻。

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接见美国运动员，而我是这次会见的翻译。总理告诉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说他们正在为中美关系展开新的一页。“我有信心中美友谊的再次开展，必然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他说。美国选手静静地听着，不知怎样回应。周总理逐一观看他们年轻的面孔，然后问：“你们同意我吗？”运动员们报以如雷掌声。这之后周总理还会见了好些美国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他的符合人性的言论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也没有隐瞒中国的问题，例如人口过多。接着的发展涉及到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我在这里简述如下。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自华盛顿安德鲁斯机场乘机起飞，对外宣布的原因是访问西贡、曼谷和新德里，最后以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为终站。但他真正的目的是秘密前往中国，进行中美建交前的谈判。在巴基斯坦，基辛格诈作肠胃不适。参与这个秘密任务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公开表示关注，并对媒介说准备把基辛格送到他的山区别墅，以便他能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康复。事实上，在第二天7月9日天刚破晓，基辛格和他的随从乘坐巴基斯坦军车到了查克拉拉机场。一个英国记者凑巧因其他事务也在现场。他看见基辛格，立即打电话给他的伦敦上司。这位上司认为不可能，没有理会，结果白白溜失了一个独家报导的机会。

（未完待续）

□ 原载《北京之春》2013年7月号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